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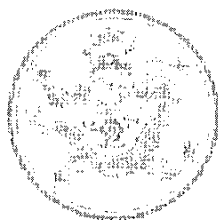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

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张忠培 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中国考古学

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张忠培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 张忠培著.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11
ISBN 7-80047-452-6

I. 中… II. 张…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388 号

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张忠培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360 千字 图数：115 幅 印张：22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047-452-6/K·214

定价：60.00 元

张忠培 简历

张忠培，现为故宫博物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

长沙市人，1934 年出生。1952 年毕业于长沙市长郡中学，1952—1956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57 年初—1961 年初在苏秉琦、林耀华指导下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61 年初开始在吉林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 年任考古专业副主任，主持创办考古专业工作，后历任考古专业主任、历史系副主任和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1987 年 6 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担任过或仍兼任一些社会职务，如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东北师大名誉教授等等。1991 年被免去院长职务后，他主要从事指导博士研究生、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

自 1958 年至今，他先后参与主持或主持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市郊、吉林白城地区、黑龙江绕河及虎林、内蒙古通辽、楚纪南城、河北蔚县、晋中、山西忻州，以及内蒙古赤峰和河套地区的大型考古研究工作，发表《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元君庙仰韶墓地》、《晋中考古》、《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合著）和《华县泉护村》（合著）等著作 13 种，《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史家村墓地的研究》、《齐家文化的研究》、《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鬲手陶鬲》、《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及《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140 余篇，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走向王国的道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均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认识。

自序

公元前1万年，我们的祖先中的一些人，开始制作局部磨光石器，另一些人发明了陶器，还有一部分人既能制作陶器，又开始栽培谷物，他们虽都迈进了新的时代，然而，谋生的方式，或者全都依赖提高了效能的渔猎——采集经济，或者仍主要依赖渔猎——采集才能维持生存。到公元前6千年之时，主营种植农业的文化，便成了当时中国人群的主流。于公元前三千二三百，主营农业的大部分居民，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并开始了推进文明的历程。公元前2千年，从主营农业居民中分化出的一部分居民和主营渔猎的一部分居民，创造了牧业占着相当比重的亦农亦牧的文明（饲养食草动物，如羊这类动物的起始时间，可推至公元前4千纪的晚期。），同时，随着牧业在整体经济中比重提高，于公元前1千年前期后段，即春秋时期，便进入游牧文明时代了。可见，中国既存在主营种植农业型的新石器时代，又存在渔猎型的新石器时代；既存在主营种植农业型文明，又存在牧业型文明。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对这两类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农业型文化的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对两类文明，尤其是对主营种植农业这一中国的主流文明走向与推进古代文明的历程，进行了探讨，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中国的文化，历来呈多元的板块结构，至迟到公元前5千年后期，则显现出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发育出了主流或主导的文化。中国的文明社会，历来也呈多元的不平衡的板块结构，至迟从夏王朝开始，就形成主导文明或文明中心。历代学者，包括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主流社会文化与文明的进程进行过观察，意见纷纭，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主流认识。近20年来，苏秉琦的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论，以及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则主导着现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成了时代的主流。要搞清楚中国主流社会是怎样走向文明的，如何推进了文明的进程，在哪个时期出现了哪些质的变化，得先弄清楚公认的中国主流社会的最重要文明阶段的特质。为此，就需要读懂许多地下无字的书和历代各家已写出的书。关于后者，我认为以

下的书是必须认真研读的：

一、是《周礼》、《礼记》和《仪礼》。

二、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议定皇帝尊号和分封与郡县之争这两件大事的记载。

三、是毛泽东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与这些书相应的社会，便是：

一、西周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宗法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

二、秦始皇推行的以皇权为主的官僚本位主宰的中央集权的郡县管理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故从秦代开始，中国实行的是以皇权为主的官僚本位主宰的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正如毛泽东在稍后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领导的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革命对象专政，这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实质。

国体制约政体，政体往往集中地表述或反映国体。如此，便可从政体上去研究国体或把握国体的度，即社会成员身份及其结构。如果对以上三个最重要文明阶段的政体与国体有了较接近真实的或真实的认识，便明白了它们的特质，也就把握了中国主流社会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政体与国体也像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发生、发展、成熟与转化过程。因此，可以从已知重要文明阶段出发，上下求索，逻辑演绎，或能揣摩未知文明之大概。王权、宗法与封建，是西周文明之特质。站在这个基点，向上求索，逻辑推理，或许能揣度出一些这三者起源与发展的线索；向下追寻，或能度量王权、宗法及封建的嬗变及其向秦朝政治体制转化情形的大概。历史的研究，当然不能止于此等揣摩，应据科学的史料求其是，但明白了历史的基本脉络或历史的大势，则能为其相关的未知领域的探索较准确地提出课题，把握住方向，掌握好度。

我自 1958 年发掘元君庙墓地起，开始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式的解析，这种研究，坚持至今。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秉琦倡导的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的研究，也是对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式的分析。我的对考古学遗存所作的社会学式研究，以 1990 年发表的《河北考古学研究展望》为界分为两段，此前以通过对墓地的解析探讨社会基层组织为主，自此以后的研究重点，转入了文明的研究。作为苏秉琦的门生，自然受其影响，追随其后。既然是追随，就只能随其后了。苏秉琦的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历程的研究，始于 1983 年东山嘴遗址座谈会。其时虽对我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参加了讨论，提出了对“东山嘴祭祀遗址与红山文化社会制度”的看法，但我受震而未动，仍沿着自己已走过的路向前展现的方向走了下来。1989 年春夏之交这场风

波，憾动了我的心灵，使我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社会的历程，《河北考古学研究展望》，便是这一憾动所产生的最初回应。人们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一是我开始认为龙山时代已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二是依据日知先生《古代城邦史研究》的主导观点，对中国先秦时代的考古所见现象作了一些说明，基本上是被他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我得感谢良渚博物馆的朋友，是他们邀我写良渚文化方面的文章，促使我看了有关良渚文化的大量论著和重新思考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于1994年写成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这是一篇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而阐述了自己观点的著作。阐释出王权源於军权，握着王权的统治者必定执掌了军权。所以中国文明的始步，就具有专制主义的性质。从此，似乎不可收拾，接着写了10篇论著，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先秦及秦汉文明的基本认识，和提出了农业型及渔猎型两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以及农业型与牧业型这两类文明的一些观点。因此，《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是自己进入文明研究第二阶段的起点。简而言之，这是我对考古学遗存进行社会学解析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和对古代文明研究所走过的两个阶段，也是我一贯追求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至今走过的路。这阶段的划分虽有相当明显的标志，然其间仍存在蛛丝的联结，阶段的转变似乎仍有其因缘，遵循着一以贯之的原则，展现出自己的学述道路。

收入这本《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的论著，计有21篇。其中的《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和《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分别是我同朱延平和我同乔梁及朱延平写成的。所有这21篇文章的写作和已经发表的情况，均在各文之后作了简单的记述。我将这文集的21篇论著分编为五组，中间的三组，大致表述了前面所说的自己对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解析，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最后一组收录文章4篇，讲的主要是关于我提出的两类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两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组内论著的排序，大致遵循写作或发表的先后。一组只收一篇文章，即《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将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的目的，仅表明我是受苏秉琦师影响而追随他投入考古学研究的。我自知这篇文章难以说明这方面的基本内涵，只是借它传达我的一点心意。

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已纵跨近50年。如上所述，我的认识在这近50年中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收集在这集子中的文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自然以后来发表的论著为准。之所以将先后写作的对同一问题不同认识的文章，均不加改动收进这个集子，目的无非是让读者如实地了解我研究的历程。

我的祖父母张福星、张罗氏，父母张玉龙、罗凤珍，养育了我，给我以启蒙教育和性格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从进入小学开始，我接受了很多既有人品又有优良学识的老师的教育，而深深地影响我学术研究的主要有两位先生，一是苏秉琦师，一是宿白先

生。关于苏秉琦先生，我在此序以及其他文章已多有提及。宿白先生从不虚论，一贯坚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地道的朴学。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使我至今仍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去努力做些细致的微观研究。借此机会，我向他们鞠躬，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仰。

我之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学术研究和工作，得益于内助马淑芹。是她全部承担了我应该分担的家务，并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

这本集子文章的收集、复印、原印错文字的改正和校阅，得到朱延平、杨晶的协助。集子中的《仰韶时代——史前时代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和《东灰山墓地研究——兼论四坝文化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位置》诸文的插图，分别是由陈光、朱延平和许永杰负责绘制的。同时，徐元邦和蔡治淮两位为编辑这本集子付出了辛勤劳动。这些都是我感到需在此予以记述的。

成稿于甲申年正月七日子时（2004年元月28日2时）

目 录

自序	(1)
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1)
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	(4)
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23)
东山嘴祭祀遗址与红山文化社会制度	(37)
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	
——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的墓地的若干分析	(40)
河北考古学研究展望	
——在河北省文物普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73)
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	(86)
仰韶时代	
——史前社会的繁荣与文明时代的转变	(142)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	(197)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	
——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	(207)
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	(221)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226)
东灰山墓地研究	
——兼论四坝文化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位置	(253)
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	(287)
窥探凌家滩墓地	(288)
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	(300)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研讨会上的讲话	(308)
原始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	
——为《农业考古》创刊四周年而作	(327)
史前考古中几个被淡漠的问题	(331)
中国史前时代研究的一些认识	(335)
《边疆考古研究》序	(342)

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秉琦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为大众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

苏秉琦教授是中国考古学重要奠基者之一，是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始人和新中国考古学的最重要指导者。他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及其壮大、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时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晚年为使中国考古学扎根于公众之中而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认识，带头做了很多工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写作，是他使中国考古学扎根于广大公众之中而作出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

现在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除《开头的话》、《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及《苏秉琦论著目录》等外，讨论的主题则有如下七节：《两个怪圈》、《学读“天书”》、《解悟与顿悟》、《“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和《双接轨》。这部著作，并非如苏秉琦教授于《开头的话》中说的那样，讲的仅是他“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读者更能从书中见到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和颇为周详的论述。

《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认识，不过，在苏秉琦教授提出史前文化多元论和文明起源多元论之前，文化及文明单元论观点，即“中华大一统观念”，是史观中的主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故研究历史应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自不能把马克思据具体历史研究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发展史看成所研究的“历史本身”。这本来是个简单的道理，但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中国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发展规律，甚至是社会发展史学说的注释。《两个怪圈》讲的是著者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或面临的问题。《学读“天书”》及《解悟和顿悟》，说的是著者如何根据史实冲出两个“怪圈”的两段经历。《“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这三节，讲的是著者悖于《两个怪圈》而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即“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这中国诸文化系统进入文明的三种类型。《双接轨》谈的是分别面向海洋和欧亚大陆的“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及古今接轨。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知识的人们，都能知道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均是著者提出的新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著作，不仅集中了著者在此之前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系统的专题研究取得的成果，也不只是这类成果的通俗的、扼要的表述，和以往比较，不但讲得更加明确，还提出了新的论述，即使熟知苏秉琦学术体系的人，也会对这本书产生新鲜之感。

苏秉琦教授的这本书的所有论述和观点，均自成体系，为一家之言，却写得深入浅出，把最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简单、明了，且文图并茂，语言娉婷，婉婉入理，读来朗朗成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启迪思想，发人深思。

但我们应报告读者的是，这是根据考古材料写成的一部书，而和据文献史料写成的史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揭示、研究人类加工遗存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遗存，和其呈现的时空关系矛盾，并找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说法，就是考古学藉以透物见人、研究历史的途径。那么，读考古学著作的人，就要时时处处盯住遗存类别、形态、性能及其和时空的关系，并看著者的解释是否符合这个实际。我想这也是读评苏秉琦教授这一著作的要领。同时，也应说明的是，该书的插图既与文字有关，又自成系统，是当认真观看、琢磨的，至于书中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则是读这书时必须随时参考的。如果读者对这本书提出的认识还有雅兴而不愿释手的话，又可循《苏秉琦论著目录》，寻找其他著作仔细阅读、钻研。

苏秉琦教授生前以宁静、淡泊作为他人生的追求，坚持自由、自主的思考，一贯忠于事实，执着于考古事业，做那些做不完的事，走那些走不完的路，作无止境的追求，终于将中国考古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苏秉琦教授同历史上以及当代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人物那样，生前走过的路曲折、坎坷、艰险，九泉之下也不宁静，直到今年有人还把他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诬陷成为德国纳粹利益服务的科辛纳（G·Kossinna）提倡的“文化圈”理论。不过，我们可以告慰苏秉琦教授的是，他的学说不仅仍受到广大考古学者的拥护，也得到国内外的史学及社会学者的推崇。

苏秉琦教授的这本著作，是瞭望中国考古学的窗口，适合于那些想了解中国考古学的不同的读者阅读。人们透过这一窗口，将见到他走过的历程，回答了哪些史学不能回

答的问题，如何进入了黄金时代，当前的处境以及未来将走的路。总之，如果有人要了解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认为可以从读这本著作开始。

（原载《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陕西省元君庙墓地的埋葬制度的剖析，探讨当时居民的社会组织。作者于 1958~1959 年曾负责这处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

一、墓地的结构

元君庙墓地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其中 51 座墓葬的年代彼此衔接较紧^①，它们中的 45 座墓葬排列规整有序（图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分为 6 排，每排均为南北方向。以自东而西为序，这 6 排墓葬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排：M453、M459、M458、M456、M455、M440、M443、M444、M454 和 M464 共 10 座。

第二排：M457、M429、M431、M425、M442、M439、M430、M447、M446 和 M470 共 10 座。

第三排：M424、M419、M420 和 M471 共 4 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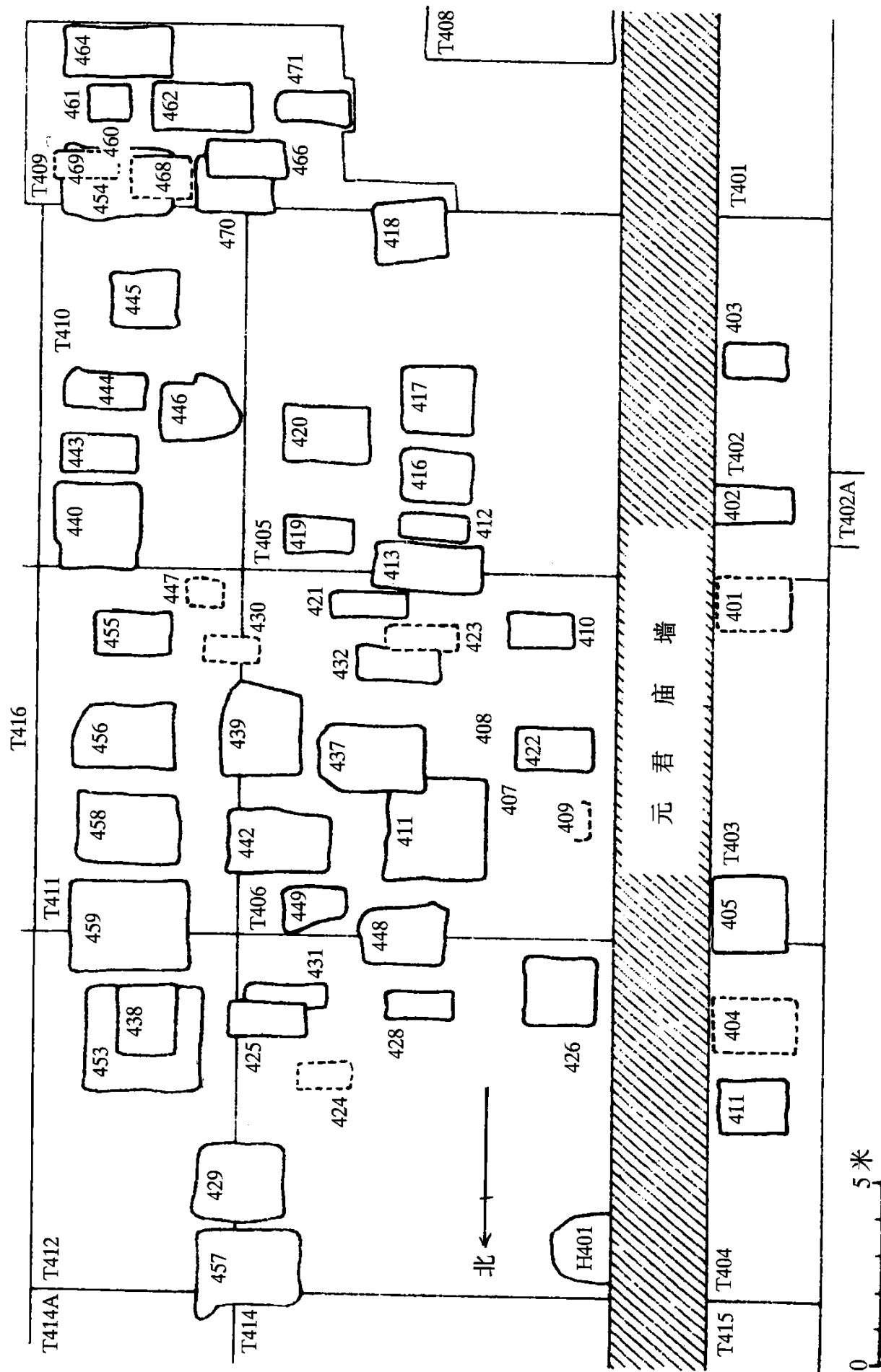
第四排：M428、M448、M441、M437、M432、M421、M413、M412、M416、M417 和 M418 共 11 座。

第五排：M426、M409、M422 和 M410 共 4 座。

第六排：M411、M404、M405、M401、M402 和 M403 共 6 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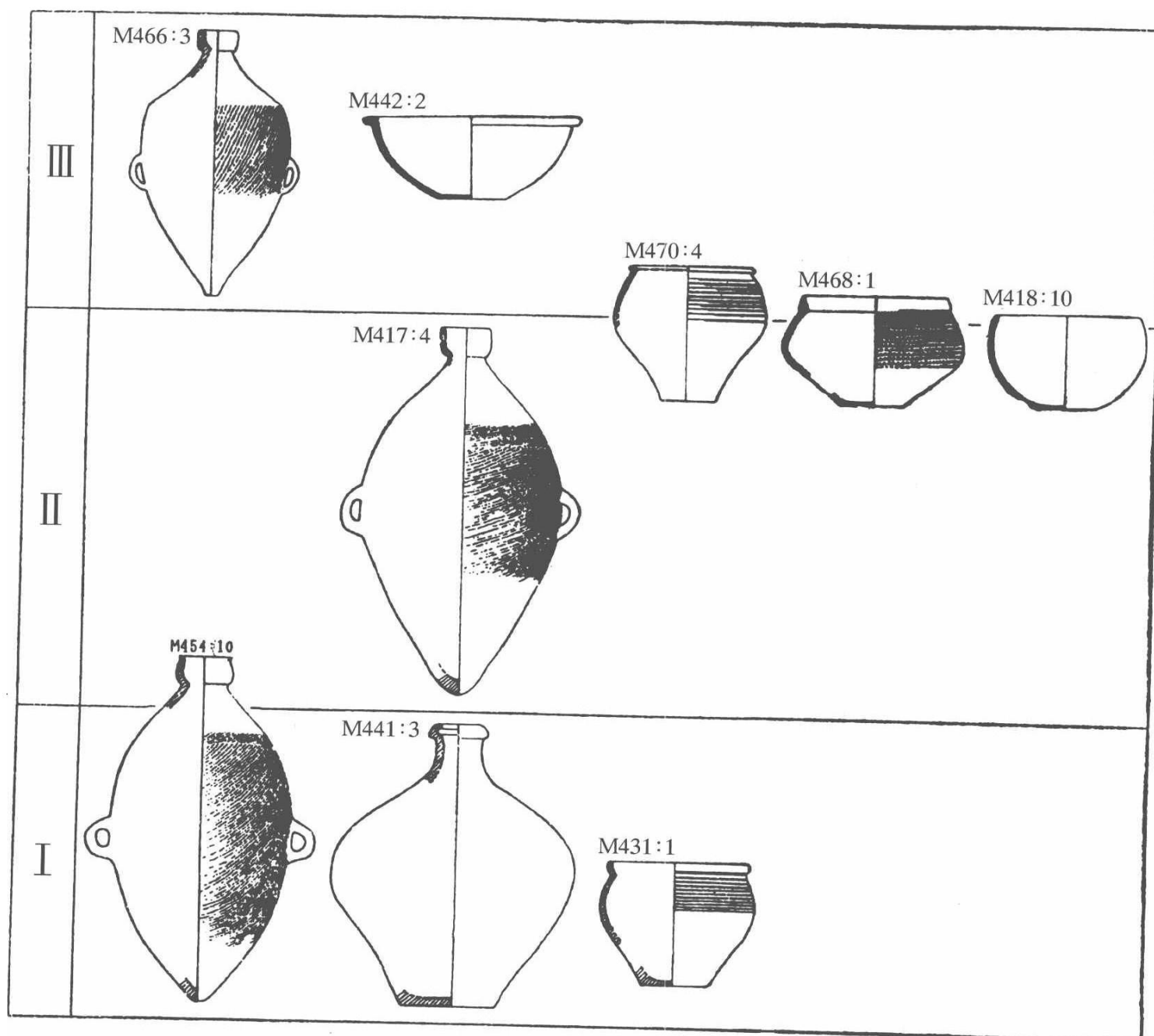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 6 座墓（M445、M449、M462、M466、M468 和 M469）呈东西向错落在两排之间，难以确定它们在整个墓地结构中的位置。

在墓地中，有 4 组 9 座墓葬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它们是：M469、M468 叠压 M454；M425 叠压 M431；M466 打破 M470；M437 打破 M441。有的同组墓葬的随葬陶器互有区别，为墓葬的编年、分期提供了地层依据。



图一 元君庙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图

根据地层和随葬陶器的类型及共生关系（图二），可将这里的 46 座墓葬分为三期。属于第一期的有 18 座，第二期的 17 座，第三期的 11 座。



图二 元君庙墓地随葬陶器分期图

M454:10, 小口尖底瓶 a M441:3, 小口平底瓶 a M431:1, 弦纹罐 Ba M417:4, 小口尖底瓶 b
M470:4, 弦纹罐 Bb M468:1, 罐 b M418:10, 鉢 Bc M466:3, 小口尖底瓶 c M442:2, 盆 a

第一期：M432、M441、M421、M456、M458、M443、M416、M429、M437、M444、M448、M454、M455、M457、M462、M453、M431、M464。

第二期：M410、M426、M439、M449、M469、M445、M411、M418、M417、M442、M470、M425、M446、M447、M468、M412、M413。

第三期：M401、M419、M420、M424、M430、M471、M428、M402、M442、M466、M05。

另外，M459、M440、M409、M403 及 M404，因遭后期破坏，致使留存下来的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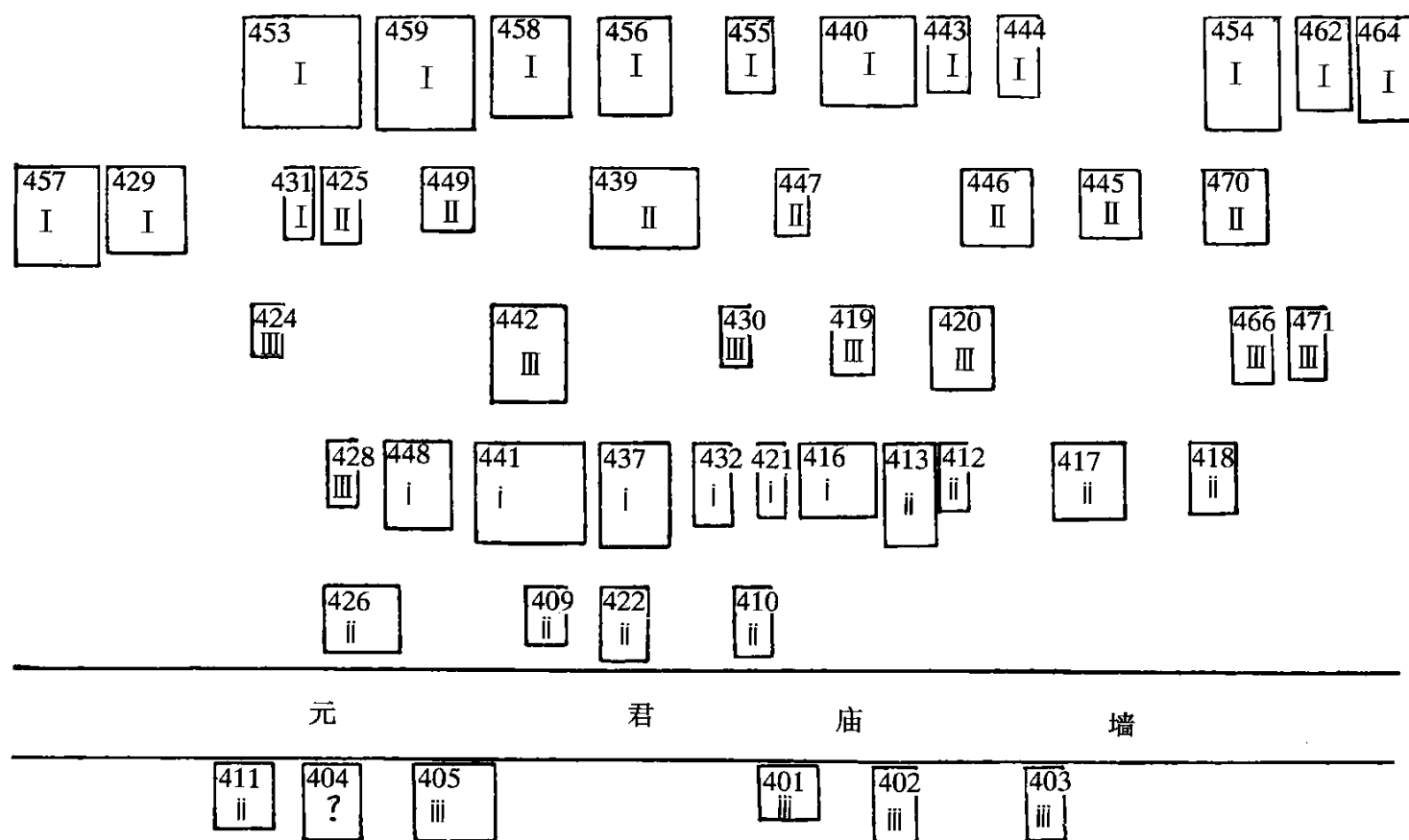
葬器物或不能辨型，或难以分期，甚至也有不见器物者。我们不能直接确定它们的期别或编年。但据它们的排列位置，可推知 M459、M440 属一期，M409、M403 分别属二期和三期，M404 为二期或三期。

结合墓葬排列位置及其期别观察，看到如下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1. 整个墓地分成两个墓区，自东往西一至三排及四排北头的 M428 为一墓区，四至六排属另一墓区。
2. 各墓区墓葬的年代顺序，同属一排的是自北而南排列，不同排的墓葬，则自东而西排列。

这种布局反映了当时定穴安葬的顺序。据此，我们可将跨排或“错落”位置的墓葬，按其年代估定其所属排列或其排列位置。这样，除已迁移了尸骨的 M468、M469 不便编入某一排外，其余 49 座墓葬的排列及期别则如图三所示。

当然，这里只是依定穴安葬规则，估定那些跨排或“错落”位置的墓葬的排列位置，至于跨排或“错落”位置的具体原因，即导致违反定穴安葬规则的那些主、客观因素，是仅据发掘所观察的现象难以具体讨论的问题。因此，图三只是依定穴安葬规则所作出的墓葬排列的示意图。关于这些墓葬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表一和表二。



图三 元君庙墓地的墓葬排列与分期示意图